

我国大学生对民主评价的差异分析^{*}

——以中国、美国、日本、印度为评价对象

余泓波 吴心喆

摘要: 当今社会,各国普遍重视民众对民主的评价。使用“中国青年价值调查”团队的相关数据,并进一步使用“民主评价的中外差异”,比较大学生对不同国家民主程度的评价。探索性的回归分析显示,大学生对民主具有一般性的支持,但其对民主的本土化与情景化理解仍深刻影响着其对民主的评价。另外,中国国家治理评价的显著影响表明,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治理体系的完善,中国治理式民主将更加得到大学生的认同,并使大学生在面对西方民主时更加具备制度自信。国家荣誉感虽然会显著提升大学生对中国的民主评价,但并未显著降低对美日的评价。这意味着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至少在本研究看来是站不住脚的。这有力地驳斥了国际民主评价指标所暗含的话语霸权。

关键词: 大学生 民主程度评价 民主理解

尽管民主在不同国家与地区有着不同的实践形态,但毫无疑问的是,当今社会已进入“民主话语的时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至少在名义上将民主政治作为制度选择,将民主治理作为发展目标,将民主话语作为政治修辞(达尔 2011: 417; 2012: 1; 潘维 2003: 3-4; 夏皮罗 2013: 15; 王绍光, 2014)。正是在此背景下,民众对其所处国家民主的评价与态度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现有的大型跨国调查项目已经将民众关于国家民主程度的评价、民主正当性的支持、民主制度绩效满意度作为考察对象,形成了丰富的数据资料。^① 基于此,相关研究者既可以从个体主观取向与社会经济层面的互动中检验民众的民主观念与态度,也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乃至不同文化区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其中,“中国样本”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不同于刻板的印象与缺乏事实依据的预判,中国民众无论在政治支持、政府满意度抑或民主程度评价上,都给予本国相当高的评价(Chan 2008; Inglehart & Baker 2000)。这一评价结果既与西方民众对其本国的政治评价形成反差,也与一些国际评价机构所谓的“客观”结果相去甚远。

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一现象?海外一些学者质疑中国民意调查是否能够反映民众的真实想法,质疑中国民众在接受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相关的调查时是否敢讲真话(史天健 2008; 王绍光 2014: 105、109)。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已从问卷设计、抽样方案、质量监控、无效选项等角度来回应此类质疑(Nathan & Shi 1993; Shi 1996 2001; 史天健 2008; 唐文方 2008: 31-40、42; 陈捷 2011: 15-17),或使用实验的方法来进一步排除“政治正确”效应与社会期望效应对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影响(Tang 2016: 142-143)。也有学者基于文化传统与中国情景进行解释,发展相关概念与理论(Huang et al. 2008; Chu & Huang 2010; Huang et al. 2013; Shi 2014)。

对于上述主题,本文借助对大学生群体的调查参与相关理论讨论。具体来说,我们将分析如下问题:作为具有重要世代更替意涵与社会政治意义的大学生群体,他们会如何评价某一国家的民主程度?在大学生的评价中,中国民主程度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何差异?政治生活与学术研究中常常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16AZZ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如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亚洲风向标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等调查项目中,均有关于民主程度评价、民主满意度、民主支持度的测量,详情可分别参考其网站: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

提及的中式民主与西式民主之争、实质型民主与绩效合法性、国际视野与民族情感、传统文化观念、政治知识与媒介接触等因素,真的会影响大学生的民主评价?这种影响是否足以促成民主评价的中外差异?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评述

(一) 民主评价的两种角度

如何评价与衡量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民主程度?有学者(Chang et al., 2011)认为,可以从政治系统的不同面向来考虑。从民主的供给面向看,政治制度的安排、领导人的产生方式、机构间的制衡、政治系统的开放性与竞争性等常被作为主要的观察因素;从民主的需求面向看,则主要指民众如何看待民主政权以及是否从中获得了其所期待的结果。具体到操作化层面,前者主要表现为评级机构与组织主持的专家评价,后者则表现为以民意调查形式得到的民众评价。这两种角度均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与讨论。有研究者(占红泮、李蕾, 2010; 赵卫涛、张树华, 2016)以西方评价机构发布的民主评价为主,介绍了其发展历史、评价依据和现实影响,整体上认为其欠缺客观性与包容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西方话语霸权特征;也有研究者(李辉, 2014)将西方评价机构的民主评价结果作为分析探讨东亚民主质量的测量与比较依据;还有研究者(肃草, 2013)综合了基于标准化框架下的评分依据、基于民意调查结果的数据评价、基于民主特定事件的计算方法三种资料来源,介绍了民主评价的五个传统与四种类型。

关于民意调查中对民主的测量及其反思,国内学界也逐渐开始关注。有学者(楚成亚, 2015)系统梳理了现有实证研究中民众对欧美国家、转型国家及中国民主的主观取向测量,并从政治文化条件、普遍与特殊性、变量设计、民主诉求动机角度展开讨论。当学者试图分析大众的民主心理取向时,无论是以某一特定国家为样本,还是进行跨国比较,都离不开对“民主是什么”本身的界定。有研究者(王衡, 2015)基于对民主的理论分歧与实证测量的分析,认为现有调查研究中民主概念在理论开放性、测量精确性、方法整合性等方面仍有待提高。

表面上看,诸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政体指数(Polity IV)等国际民主评价指数似乎更加客观。但实际上,其评价标准的构成与执行过程也颇具主观性,只是这种主观性来自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底色与精英视角。相对而言,民意调查虽然也具有精英化的框架设计,但由于其直接询问民众的态度,更具大众化与真实性。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民主的评价却又具有本土化特色,从而限制了对其进行一般化推论与跨文化比较。

本文采用民意调查路径,意在通过大学生问卷调查获取他们对不同国家民主程度的评价。虽然大学生相对而言具有更强的内部同质性与更高的政治认知水平,但为避免单纯民意调查路径的不足,本文做了以下尝试:第一,通过将大学生对本国民主程度的评价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使得评价结果具有更为清晰的相对意义;第二,探索性地将更多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以期更好地理解大学生评价民主时的具体考量与影响因素。

(二) 现有相关研究简述

青年大学生群体关于民主的主观取向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20世纪末就有学者(余振、郭正林, 1997)通过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我国大学生民主意识之异同。总体上看,香港地区的大学生最倾向西方民主观念,同时也可看到传统权威政治文化的影响;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大学生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强,将民主政府等同于万能、廉洁公正的政府;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则最受现实政治氛围的影响,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则相对较少。一项研究(马岭, 2002)表明,大学生既肯定了民主的某些正面价值,同时也认为民主受物质条件的制约,仅具有形式公正性。有研究者(吴鲁平、彭冲, 2013)通过因子分析将民主特征区分为三个部分,发现大学生对共同民主特征认同最高,对中国的民主特征认同次之,而对西方的民主认同则最低。此外,这项研究发现,在0-10分的范围内,大学生给十

年前的中国民主程度评分均值为 0.383,对目前的评分均值为 0.521,对十年后的民主程度预期则为 0.656。也有研究(张健,2014)将大学生党员作为研究对象,强调了新媒体平台对其民主素养的影响。但遗憾的是,其中多是概括式的界定与论述,而未见实证依据。

除去专门化的讨论,也有研究将大学生的民主取向纳入一般性的社会政治态度或公民意识中进行考察。在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改革开放的孩子们”的“70后”“80后”青年时,有研究(田丰,2009)发现,他们相对来说具有更低的社会公平感和更强的民主意识。在对“90后”大学生心理发展特征进行分析时,有研究者(崔景贵,2008)认为,相对于“80后”大学生,“90后”大学生更推崇民主平等,也更具自主性。有学者(周光礼、吕催芳,2011)在分析中国大学在公民意识教育上的政治社会化效应时,发现大学生公民意识总体较强,但其民主参与的政治效能感却较低。

哪些因素会影响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中国民众的民主评价?对“民主”本身的理解与态度自然成为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自由选举、经济繁荣、人民公决等民主基本要素的认同度越强,则其对我国民主程度的评价显著越高(孙娜,2015);也有研究发现,政治制度评价中的各个方面虽然均会提升民主的满意度,然而国人显然更关注其中关于实质民主而非程序民主的部分(王衡,2014)。制度绩效也是用来解释民主评价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对政治组织与公共媒体的信任显著提升了民主评价(孙娜,2015)。但也有研究指出,制度绩效对民主满意度的提升主要依赖于政治绩效而非经济绩效(王衡,2014)。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体接触与使用行为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赵联飞,2015)。有文章认为,互联网全球化、开放化、多元化的价值观一方面会增强大学生的自由民主意识,另一方面也会使其更易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周可卫,2010)。调查也发现,网络作为大学生获取社会信息的主要渠道,使得公民知识的传播由单向的直线关系转变为多维的互动关系,但其商业属性和娱乐色彩也导致大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缺乏严肃的思考(周可卫,2010;周光礼、吕催芳,2011)。不过,实证研究显示,无论是一般民众(孙娜,2015)还是大学生(姚君喜,2012),互联网对民主取向的影响并非十分显著。此外,研究也发现,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公民教育的效应并非发挥关键作用(周光礼、吕催芳,2011),但对“两课”的喜欢程度会增强大学生对中国民主特征的认同(吴鲁平、彭冲,2013)。

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对大学生民主态度的研究数量较多,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仍有部分研究在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方面存在不足(肖唐镖、余泓波,2015)。而专门讨论大学生的民主程度评价,尤其是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评价的比较研究,则尤为缺乏。在解释性的研究中,中国式民主特征、制度绩效、媒体使用、政治理论教育等方面得到了相对较多的讨论。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因变量概念化与操作化

本文使用了“中国青年价值调查”团队^①组织开展的有关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问卷调查的相关数据资料。该调查对象为江苏省内六所大学2015年秋季入学的本科生。这六所大学的选定主要是考虑以下因素:六所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位于不同层次(“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普通本科大学、民办本科大学);六所大学的学科分布与办学方向不同(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大学、行业类大学)。另外,课题组也充分考虑了调查的便利性和样本的可获得性,所选六所大学均具有较好的配合度和合作经验。在每一所大学中,均采用分层整群抽样(stratified-cluster sample)的抽样方案。以大学为分层依据,以专业(不分专业的则以系所)为初级抽样单位,凡被选中的专业则整群入选,之后通过加权使其符合母体的专业分布。然后依据每一所大学2015级新生人数确定该校的样

^① 该项目为南京大学2015年文科创新团队“中国青年价值调查”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组成员包括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苗红娜副教授、赖静萍副教授、本文作者以及部分研究生。

本量,最终选取六所大学 250 个初级抽样单位中的 53 个,有效样本 3759 个。

本文中大学生的民主评价,意指受访大学生对某一国家民主程度的评价。具体测量题目使用了现有大型调查中常用的 10 分制民主评量尺度。在问卷中,我们设计了这样的导语“如果 1 代表完全不民主,10 代表完全民主,在程度上,数字越小越不民主,数字越大民主”。此后则接续提问“请问您认为: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目前的民主程度属于哪一种?”选项为 1 至 10 的分数。

为了使民主评价具有相对意义及比较对象,本文进一步使用“民主评价的中外差异”来比较大学生对不同国家的评价,指的是受访者对中国与某一其他国家民主程度评价之间的差值。在测量上,使用中国民主评价得分减去某一其他国家民主评价得分,得到一个取值范围在 -9 到 9 的变量。其中 0 表示中外民主评价没有差异,负值意味着对中国民主的评价低于其他国家,正值则意味着对中国民主的评价高于其他国家。

(二) 研究假设、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现有研究表明,生活在东亚社会的民众对民主的理解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更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Chu et al. 2008),即便是同一社会的民众对民主可能也有不同理解(Shin & Cho 2010)。现有研究还表明,对民主本身的态度与理解将直接影响大学生对民主程度评量,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控制其他变量,受访者越认为民主适合中国,则其对中外民主评价的差值越大。^①

假设 2: 控制其他变量,受访者对民主的理解中实质型民主的成分越重,则其对中外民主评价的差值越大。

其中,民主适合度使用的问题为“请问您觉得民主对中国的适合程度如何? 1 表示完全不适合,10 表示完全适合。在程度上,数字越小表示越不适合,数字越大表示越适合。您认为适合程度如何?”民主理解则使用四组题目,每组均有四个选项,分别强调从社会公平、良好治理、程序规范、政治权利来理解民主,其中前两方面归并为实质型民主理解,后两方面归并为程序型民主理解(Huang et al. 2013)。在测量上,每选一项代表实质型民主的选项,则计 1 分,之后累计得到受访者民主理解中的实质型成分。

为了考察政府治理绩效评价对大学生民主评价的影响,本文将受访者对社会福利保障、环境状况、贫富差距、官员廉洁程度、公民的政治权利、国民经济发展、国防和对外政策、医疗卫生、中小学教育等评价(1-10 分)加总之后的均值作为中国国家治理变量纳入模型,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控制其他变量,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越好,则其对中外民主评价的差值越大。

国际视野与民族情感作为重要的政治态度影响着大学生对不同国家民主程度的判断,尤其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提出及其在青年学生中产生的广泛政治认同与情感共鸣,更有必要将其纳入本文讨论。已有学者(Tang 2016: 56-57)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目前大众民族主义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民族主义对政权的稳定与合法性具有很强的正面影响,同时也明显降低了公众对自由民主的需求。而这种民族主义是否会提升大学生对中国民主程度的评价,又是否会降低对其他国家民主程度的评价?基于此,本文从国际视野与国家荣誉感角度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 控制其他变量,受访者越关心世界大事,则其对中外民主评价的差值越小。

假设 5: 控制其他变量,受访者的国家荣誉感越强,则其对中外民主评价的差值越大。

以儒家传统为基调的传统文化因素深刻影响了国人的政治观念与行为,其中深厚的等级式权威取向与家庭主义价值观被认为不利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杨国枢,2005;马得勇,2007;Shi,

^① 差值越大,则意味着相对于外国,受访者给予中国民主程度越高的评价。下同。

2014)。本文使用传统家庭观念因子^①与传统政治观念因子^②检验传统文化因素对大学生对中外民主评价差异的影响,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6: 控制其他变量,受访者传统家庭观念(传统政治观念)越强,则其对中外民主评价的差异越大。

政治知识、信息和传播媒介与包含民主评价在内的政治态度关系紧密,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并着重分析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由于本次调查对象均为大学新生,因而在对其政治理论课的考察时,问卷主要测量了其对高中政治课程中不同内容的兴趣度,具体又分为一般性政治常识(如:公民的政治生活、当代国际社会等)和思想政治教育(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次,就政治知识而言,分为国内政治知识与外国政治知识两类进行测量。最后,考虑到大学生一般化的媒体使用行为在个体间差异较小,因而本文聚焦于考察其通过互联网获取政治新闻的频率、观看海外文艺作品的频率。

此外,本文还将大学类型(一本及以上大学=1,其余=0)、性别、专业学科、生源户籍、家庭月收入当作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三)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描述分析展示大学生对不同国家民主程度的评价及中外差异,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别以各国民主评价、中外民主评价差为因变量。通过某一自变量对中国、外国、中外差的影响与否及其程度,进一步分析差异产生的具体机制。单一对象机制指的是某变量只影响大学生对中国或外国中一方的民主程度评价,并以此形成民主评价的中外差;同向影响机制则指某变量同时影响大学生对中国和外国双方的民主评价,且方向相同,但由于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形成民主评价的中外差;反向影响机制则指某变量同时影响大学生对中国和外国双方的民主评价,且方向相反,由此形成民主评价的中外差。

三、数据分析

(一) 大学生对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民主程度的评价

图 1 显示了本次调查中大学生对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目前民主程度评分的分布状况。从每个国家比例最高的两个分数来看:有超过四成五的大学生给予中国民主程度 6 分或 7 分的评价,而有五成的大学生给予美国民主 8 分或 9 分的评价,对日本则有四成大学生给予了 7 分或 8 分评价,对印度则有将近四成的大学生给予了 4 分或 5 分的评价。除美国之外,我国大学生给予中、日、印的民主评价得分均呈现由中间值(5、6)向两端值(1 和 10)比例递减的倒 U 型,而对美国民主评分则出现(除 10 分以外)分数越高、比例越高的分布。

如果在 1 分到 10 分范围内,我们把 6 分称作“民主及格线”的话,则从图 2 可知:大学生对美国民主评价的均值为 7.55,对中国(6.23)与日本(6.49)的民主程度评价较为相似,而对印度民主的评价则为不及格(4.79)。均值反映了整体性的民主水平,那么认为这四个国家民主程度及格的大

① 将受访者对“人活着为了养老育小”“家庭不幸福其他方面再成功也不幸”“光宗耀祖对一个人的人生很重要”“家庭美满是唯一目标”四个说法的态度通过因子分析生成传统家庭观念因子(KMO 值 0.671,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卡方 281.475, 显著性 0.000, 累计总方差解释 45.95%)。

② 将受访者对“妇女不应该享有和男性一样的参与政治的权利”“政府的领导人就像大家庭的家长,他们关于国家事务的决定,公民都应该服从”“只要有一位道德高尚的领导人,我们就可以让他决定一切”“好的领导比好的法律与制度更重要”“有些人智慧确实比较高超,所以他们应该在政治上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五个说法的态度通过因子分析生成传统政治观念因子(KMO 值 0.777,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卡方 692.195, 显著性 0.000, 累计总方差解释 48.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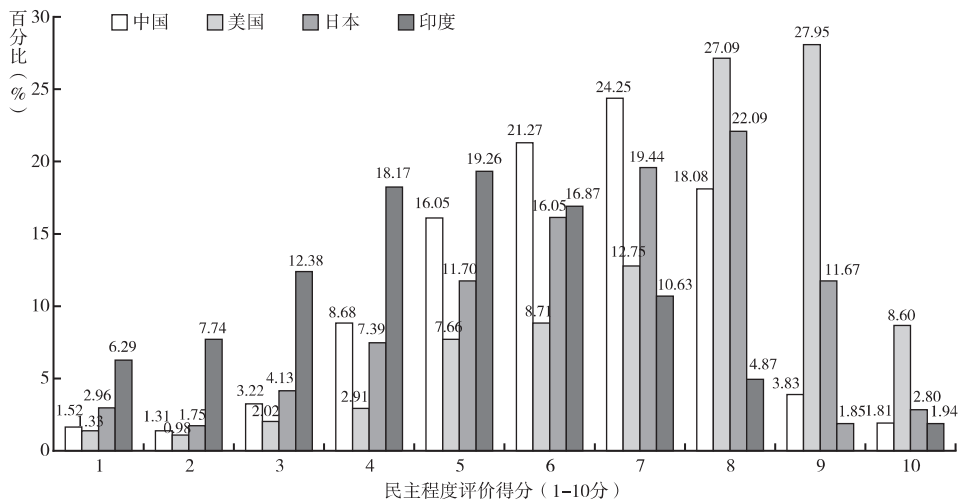


图1 大学生对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民主程度评价各分数比例分布

学生各有多大比例？从图中可知，八成五的大学生认为美国民主程度达到及格线，认为中国和日本民主程度及格的大学生则有七成左右，认为印度民主达到及格水平的大学生仅有36.16%。由此可见，整体上我国大学生给予了美国民主最高的评价，而中国和日本次之。但从均值和及格比例来看，我国大学生对这三个国家的民主程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然而在中国大学生眼中，印度的民主程度均值并不及格，且这一看法得到六成五大学生的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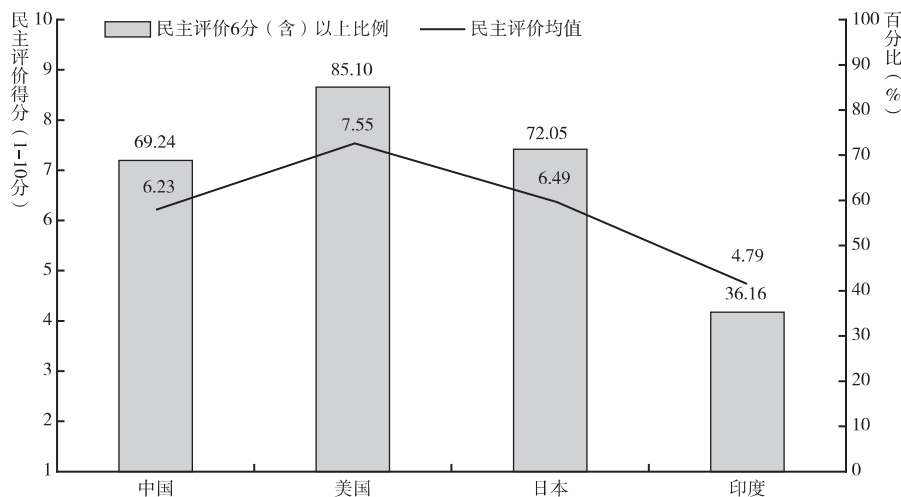


图2 大学生对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民主程度评价得分均值及6分以上比例

(二) 大学生民主评价的中外差异: 以中国为基准的分析

如前文所述，我们将大学生对中国民主程度的评分分别减去其对美、日、印的评分，得到民主评价的中美差异、中日差异、中印差异。图3显示中美差异的分值小于0，意味着大学生认为美国民主程度在1至10分范围内高出中国1.32个评分；中日差异均值为-0.26，意味着从整体水平看中国与日本民主程度相当。而中印差异为1.45，表明大学生对中国民主程度的评价高于印度。此外，从中外差异均值大于等于0的比例来看，近三成大学生认为中国民主程度高于美国，近九成大学生认为中国民主程度高于印度，而对日本而言则刚刚达到五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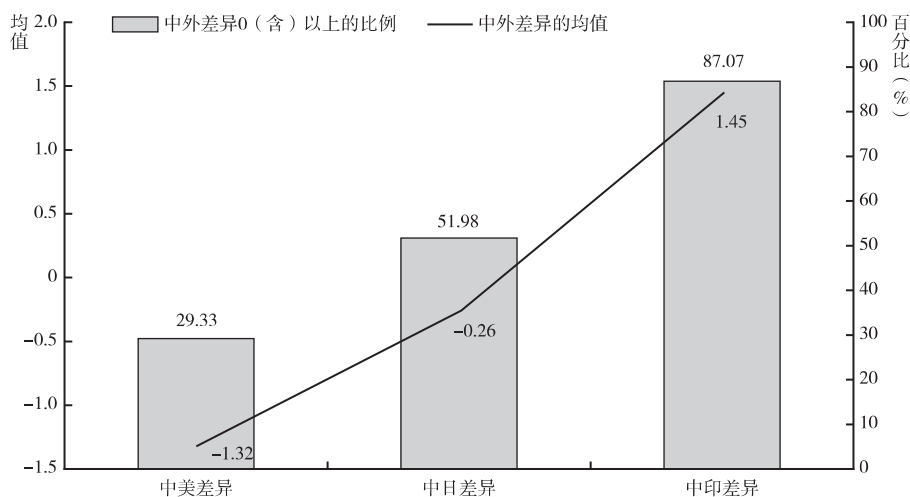


图3 大学生民主评价中外差异的均值及0(含)以上比例

(三) 大学生民主评价结果与现有国际评级机构评价结果之比较

本文进一步将大学生对四个国家民主程度的评价与2015年全国调查中一般中国民众的评价以及反映2015年民主状况的自由之家、经济学人民主指数进行比较(见表1)。由于不同评价之间的分值范围不同,表1进一步报告了以中国得分以基准的倍数比。虽然我国大学生与一般民众对美国的民主程度评价都略高于中国,但这一差异在一般国民中仅有0.45,在大学生中则达1.32。另外,中国民众给日本的民主程度评价较低(中日差值为1.51),而大学生对日本的评价则略高于中国(中日差值为-0.26)。但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一般民众,其对印度的评价都一致地较低。

当把民意调查数据和国际评价机构数据进行比较时,就会明显发现其中的冲突之处。虽然我国大学生认为美国民主程度高于中国(倍率比1.21),但其远低于自由之家(倍率比5.63)、经济学人民主指数(倍率比2.56)的评价结果。此外,即便大学生与一般民众均认为中国民主程度高于印度,但在国际评价机构的标准来看,印度的民主得分分别是中国的4.81倍和2.46倍。有学者认为这大概与自由之家的意识形态取向和评价体系有关,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国家的民主水平(王绍光2014:105、109)。受篇幅限制,本文并未对此展开深入分析,但这一现象应得到后续研究的关注。

表1 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在不同民主评价机制下的比较(2015年)

	大学生调查 评价(1-10)	倍数比*	全国调查 评价(1-10)	倍数比*	自由之家 (0-100)	倍数比*	经济学人民 主指数(0-10)	倍数比*
中国	6.23	—	6.50	—	16	—	3.14	—
美国	7.55	1.21	6.95	1.07	90	5.63	8.05	2.56
日本	6.49	1.04	5.54	.85	96	6.00	7.96	2.54
印度	4.79	.77	4.79	.74	77	4.81	7.74	2.46

注: * 倍数比 = 美(日、印)得分 ÷ 中国得分。

(四) 大学生民主评价的中外差异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尝试探索大学生民主评价中外差异的影响因素,本文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表2所示,模型A的因变量为大学生对中国民主程度的评价,模型B1的因变量为对美国民主程度的评

价,而模型 B2 的因变量则为大学生民主评价的中美差值。通过模型 A、B1、B2 的比较,可以进一步确定相关自变量是否影响以及何种机制影响大学生民主评价的中美差异。模型 C1、C2 与模型 D1、D2 也可结合模型 A 照此解读。此外,整体上看,模型 A 调整后的 R 平方值为 33.6%,这意味着本文所选的自变量较好地解释了大学生对中国民主程度评价的变异。表 2 中其余模型调整后的 R 平方值则稍低(约在 5% - 15%) 相对而言其因变量变异的解释量低于模型 A。但由于本文立意于中外差异的分析,所以作为比较基准的模型 A 尤为重要,表 2 中各模型依然符合探索性尝试的初衷,并具有可比较性。^①

从民主本身来看,大学生越认为民主适合于中国,则相应地对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的民主程度都越给予更高的评价。民主适合度反映的也是大学生的民主支持,而回归分析表明,这种对本国的民主适合度的认同,事实上也意味着对民主制度本身的支持,由此普遍推动了对其他国家民主的评价。进一步通过模型间的比较看,虽然民主适合度对中外民主程度的评价都是正向的,但其对中国的推动效应明显高于外国。也就是说,民主适合度以前文所述的同向机制加大了民主评价的中外差异,假设 1 得到了验证。

模型 A 表明大学生对实质型的民主理解会显著提升其对中国民主的评价,而模型 B1、C1 则表明其会显著降低大学生对美国和日本民主程度的评价,对印度则不显著。进而通过模型 B2、C2 可知,实质型民主理解以反向机制扩大了大学生民主评价的中美、中日差异,模型 D2 则表明其以单一对象机制扩大了民主评价的中印差异。由此,假设 2 得到了验证。

大学生对国家治理的评价会显著提升其对中国、美国、日本的民主程度评价,但由于对中国的提升效应显著强于外国,因而以同向影响机制扩大了民主评价的中外差异,假设 3 得到了验证。从国际视野与民族情感来看,越关心世界大事的大学生对美国民主程度的评价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越高,但在其他模型中均不显著,因而假设 4 未被验证。国家荣誉感会显著提升大学生对中国民主的评价,但对美、日则不显著,以单一对象机制加大了中美、中日民主评价差值。而模型 D1 则显示,国家荣誉感会降低大学生对印度民主的评价,并以反向影响机制加大了中印民主评价差值。虽然影响的具体机制不同,但假设 5 得到了验证。

模型 A 表明,无论是传统家庭观念还是政治态度,均不影响大学生对中国民主程度的评价,但传统家庭观念会显著降低大学生对美国和日本民主评价,由此加大中美、中日民主差值,而对印度则不显著。传统政治观念会降低大学生对美国的民主评价,而增加对印度的民主评价。因此,假设 6 未得到验证。

在政治知识、信息与媒介类的控制变量中,受访大学生对高中政治课的兴趣程度在所有模型中均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这与现有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无论是高中政治课程,还是大学“两课”,其对大学生政治态度与观念的影响似乎都没有预期的明显。国内政治知识会显著提升大学生对中国和美国的民主程度评价,但在其他模型中均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而国外政治知识越多的大学生对中国的民主评价则会越低,并由此降低了大学生民主评价的中外差值。虽然本文进一步将大学生媒体使用行为聚焦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与海外文艺作品观看,但其影响依旧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常提及的海外文艺作品对大学生潜在的意识形态渗透在本研究中并未得到支持,观看海外文艺作品并不会显著影响大学生对中国民主的看法,仅会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提升对美国的民主评价和降低对印度的民主评价。

相对于其他大学,就读于一本大学的受访者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给予日本更高的民主评价,在 0.1 的显著性水平上给予印度更高的民主评价,而对中、美则不显著。现有研究表明,在一般中国民众中,女性对我国的民主评价明显高于男性(孙娜,2015),而女大学生对西方民主特征的认

^① 由于调查问卷问项容量有限,故在设计问卷时未考察大学生对美国、日本、印度的更多的态度与评价。如作为民主程度的重要自变量“国家治理状况”,问卷仅涉及本国评价,而未有外国评价。此外,由于相对本国(中国)而言,大学生对美国、日本、印度等的认知水平相对较低,这也是问卷设计未多涉及外国状况的考虑之一。

同度低于男性(吴鲁平、彭冲 2013) 其民主参与倾向也显著低于男性(周光礼、吕催芳 2011)。本研究发现,女大学生对中国和美国的民主程度评价显著高于男生,而对印度的评价则显著低于男生,并在模型 D2 中表现出对民主评价中印差值的显著提升。理工医学科的大学生相对于人文社科的大学生,会显著给予中国民主更高的评价,但对外国民主评价则无学科差异。由此,专业学科以单一对象机制提升了大学生民主评价的中外差异。生源地户籍为城市的大学生会显著给予中国民主更低的评价,而给予美、日更高评价,并由此显著降低了中美、中日的民主评价差值。家庭月收入作为家庭背景变量则均不具备统计显著性。

表 2 大学生民主评价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 A	模型 B1	模型 B2	模型 C1	模型 C2	模型 D1	模型 D2
	中国	美国	中美差	日本	中日差	印度	中印差
民主对中国适合度	.296*** (.016)	.174*** (.021)	.082*** (.024)	.140*** (.023)	.092*** (.026)	.137*** (.022)	.109*** (.023)
实质型民主理解	.064*** (.023)	-.041* (.030)	.087*** (.034)	-.050** (.034)	.092*** (.038)	-.026 (.032)	.079*** (.034)
中国国家治理评分	.350*** (.019)	.061** (.024)	.221*** (.027)	.131*** (.027)	.141*** (.030)	.290*** (.025)	.006 (.027)
关心世界大事	.027† (.039)	.062** (.050)	-.032† (.057)	.022 (.055)	-.001 (.062)	-.002 (.052)	.024 (.056)
国家荣誉感	.113*** (.042)	-.009 (.055)	.095*** (.062)	-.027 (.060)	.105*** (.067)	-.036* (.057)	.128*** (.060)
传统家庭观念	.003 (.027)	-.046* (.035)	.041* (.039)	-.043* (.038)	.039* (.043)	-.009 (.036)	.011 (.039)
传统政治态度	.004 (.029)	-.088*** (.038)	.078*** (.042)	-.022 (.041)	.023 (.046)	.084*** (.039)	-.079*** (.042)
高中政治课兴趣: 一般政治常识	.016 (.019)	.026 (.024)	-.009 (.028)	.019 (.027)	-.005 (.030)	.010 (.025)	.002 (.027)
高中政治课兴趣: 思想政治教育	-.015 (.002)	-.024 (.003)	.008 (.004)	-.001 (.004)	-.011 (.004)	-.011 (.003)	-.002 (.004)
国内政治知识	.052** (.021)	.044* (.028)	-.000 (.031)	.008 (.030)	.029 (.034)	.008 (.029)	.032† (.031)
国外政治知识	-.048** (.035)	.042* (.046)	-.072*** (.051)	.026 (.050)	-.057** (.056)	.005 (.047)	-.044* (.050)
上网看政治新闻	.013 (.035)	.025 (.046)	-.010 (.052)	.015 (.050)	-.003 (.056)	.034† (.048)	-.022 (.051)
观看海外文艺作品	-.001 (.038)	.035* (.050)	-.032† (.056)	-.007 (.055)	.004 (.061)	-.033* (.052)	.031† (.055)
大学类别(一本=1)	-.011 (.055)	.018 (.071)	-.024 (.080)	.061** (.078)	-.060** (.088)	.034† (.074)	-.041* (.079)
性别(男性=1)	-.034* (.056)	-.062** (.073)	.025 (.082)	-.020 (.080)	-.006 (.090)	.055** (.076)	-.082*** (.081)

续表 2

	模型 A	模型 B1	模型 B2	模型 C1	模型 C2	模型 D1	模型 D2
	中国	美国	中美差	日本	中日差	印度	中印差
专业(理工医 = 1)	.062*** (.056)	-.020 (.074)	.065*** (.083)	-.027 (.081)	.067*** (.090)	-.002 (.077)	.052** (.081)
户籍(城市 = 1)	-.046** (.052)	.042* (.067)	-.071*** (.076)	.063*** (.074)	-.086*** (.082)	-.017 (.070)	-.020 (.074)
家庭月收入	-.005 (.000)	.007 (.000)	-.010 (.000)	.002 (.000)	-.005 (.000)	-.016 (.000)	.011 (.000)
常数项	.094 (.263)	4.665*** (.342)	-4.595*** (.386)	4.134*** (.376)	-4.021*** (.421)	1.776*** (.357)	-1.654*** (.379)
有效样本量	3164	3161	3160	3157	3156	3158	3157
调整后的 R ²	.336	.077	.147	.056	.102	.134	.063
F 值	89.99***	15.65***	31.20***	11.27***	2.83***	28.01***	12.85***
最大 VIF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1.32

注: 表格中报告的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括号中均为标准误;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四、研究发现与讨论

就大学生对中、美、日、印四国民主程度评价的描述分析来看,大学生对美国的民主程度评价最高,而对中国与日本的评价次之,对印度的评价最低。其中,有八成五的受访大学生认为美国民主达到及格线(6分及以上),有七成的大学生认为中国与日本民主及格,而认为印度民主及格的大学生仅三成多。进一步的中外比较表明,在大学生眼中,中美民主差值为-1.32,而中日民主程度基本持平,中印民主差值为1.45。与一般中国民众相比,大学生给予日本更高的评价,在中美民主评价上虽差值不同,但排序相同(美国高于中国)。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一般国人,其对中、美、日、印的民主评价均不同于自由之家、经济学人等国际民主评价的结果,这既有评价标准的差异,也有意识形态的分歧。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研究尝试从多个维度分析大学生民主评价中外差异的成因,结果发现:对民主适合度的评价作为一种民主支持力量,会普遍影响大学生对各国民主的评价,只是对中国民主程度的提升效应更明显。而民主理解中实质型民主的成分越重,则越青睐中国民主,而降低对外国民主的评价,由此加大大学生民主评价的中外差异。由此可见,虽然大学生对民主的一般性支持具有普遍效应,但其对民主的本土化与情景化理解,仍然深刻影响着其民主评价。另外,对中国国家治理的评分显著提升了大学生对中国民主的评价,也加大了其中外差异。这表明,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治理体系的完善,中国治理式民主将更加得到大学生的认同,并使大学生在面对西方民主时更加具备制度自信。国家荣誉感虽然会显著提升大学生对我国的民主评价,但并未显著降低对美日的评价。这意味着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至少在本文是站不住脚的,作为中国人的荣誉感并不会产生所谓的对美日民主的负面影响。传统文化因素对大学生民主评价的中外差异有一定影响,且其主要通过影响对外的评价来发挥效应。作为政治社会化重要渠道的学校教育,其中政治课程的影响如此衰微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而互联网也并不像有的研究所认为的那样会侵蚀、危害大学生的政治观念。相反,本文认为,在互联网与新媒体日益普及的今天,应尽量采用工具化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而非事先预设其可能的负面影响。此外,学校类别、学科专业的影响明显强于家庭背景因素。这表明,对大学生的民主评价而言,家庭的影响效应也逐渐为学校所取代(周光礼、吕催芳 2011)。

总体来看,在对此议题尚缺乏更深度研究的今天,本文凭借探索性分析发现:大学生民主评价及其中外差异虽然相对于一般民众表现出对外国更强的开放性,但仍是基于基本的事实与信息的。这能够有力反驳国际民主评价指标暗含的话语霸权。大学生既能够将民主的一般化支持纳入考量,同时也深刻仰赖对实质型民主的理解和治理式民主的逻辑。这意味着我国大学生在评价中外不同国家的民主程度时,能够较好地进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有机结合。此外,国家荣誉感虽然显著增强大学生对本国民主的信心,但并不会降低他们对美日民主的评价。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大学生民主评价的理性与客观。

从研究的视角看,虽然“民主”一词本身就内嵌了“人民”作为其主体,但在关于民主观念的研究中,普通民众往往仅是被动地作为观念的承载者,而鲜少出现在研究的中心位置。更有甚者,包含大学生在内的社会成员关于民主的主观取向往往被视作需要改造、矫正的对象。诚然,由个体主观态度汇集而成的民主政治文化或许与现实民主政治发展所需的文化环境有一定程度的不匹配,应以政治文化之发展来促进政治发展。但在真实世界的政治场景中,恰恰是社会成员在个体微观层面上面对了最纷繁复杂的民主理念,最广泛地参与了直接或间接的民主实践,既提供着民主政治得以建立的合法性支持,也检验着民主体系所产出的民主供给是否合格。几乎不用太多的学理阐释,就可以了解,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中,民众对民主的看法何以重要、有多重要。正是基于此种研究立意,本文将大学生对民主的评价视作需要经验性考察的研究议题,而非简单的价值判断问题和思想教育问题。而社会调查方法的发展与进步,为我们捕捉这种关乎民主的民意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江苏省内六所高校的大学新生,所以可能研究结论无法推广到全体国民,也无法推论到高年级大学生。但由于大学生本身省籍的多样性和本次调查高校的差异性,其研究结论对了解当代中国大学生亦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调查团队会在后续研究中,通过同一母体的再次调查考察大学年级的变异性,同时通过扩大样本学校来增强代表性。此外,就研究主题而言,学界仍缺乏更为精细的讨论。互联网的政治态度效应为何常未被证明?大学政治理论课程如何提高其社会化效应?校园生活与同侪交流是否影响大学生的民主观念与评价?就研究方法而言,基于规范的抽样调查与问卷设计的实证研究应更多地应用于此领域,减少凭借印象与直觉进行的说教式研究。

参考文献:

- 陈捷 2011,《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安佳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楚成亚 2015,《西方“民主价值观”测量的方法与启示》,《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
- 崔景贵 2008,《90后大学生心理发展的基本特征》,《教育与职业》第35期。
- 达尔,罗伯特 2011,《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佟德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2012,《论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辉 2014,《东亚民主的质量:测量与比较》,《开放时代》第5期。
- 马得勇 2007,《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期。
- 马岭 2002,《当代大学生民主观念之透视——一次关于民主的“模拟实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1期。
- 潘维 2003,《法制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 史天健 2008,《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实证研究报告》,潘维、玛雅主编《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肃草 2013,《西方民主测量的局限性和迷惑性:概述与分析》,《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
- 孙娜 2015,《影响我国民主程度评价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第4期。
- 唐文方 2008,《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胡赣栋、张东锋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田丰 2009,《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70后”和“80后”青年的公平感和民主意识研究》,《青年研究》第6期。
- 王衡 2014,《“绩效评价”,抑或“政治评价”?——转型期中国公民民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管理学刊》第4期。

- 2015,《公众如何定义民主:理论分歧与实证测量》,《国外理论动态》第8期。
- 王绍光 2014,《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吴鲁平、彭冲 2013,《我国大学生对民主看法的研究——对北京市1295名大学生的调查分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1期。
- 夏皮罗 伊恩 2013,《民主理论的现状》,王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肖唐镖、余泓波 2015,《近3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政治学研究》第4期。
- 杨国枢 2005,《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杨宜音主编《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姚君喜 2012,《媒介接触与社会公正认知、态度及行为——以上海在校大学生为对象的实证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第3期。
- 余振、郭正林 1997,《当代中国青年的民主意识——对海峡两岸四地区大学生的民主意识比较》,《青年研究》第6期。
- 占红沔、李蕾 2010,《初论构建中国的民主、法治指数》,《法律科学》第2期。
- 张健 2014,《利用新媒体平台提升大学生党员民主素养的思考》,《江苏高教》第6期。
- 赵联飞 2015,《中国大学生中的三道互联网鸿沟——基于全国12所高校调查数据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赵卫涛、张树华 2016,《西方民主测量的理论局限与政治反思》,《政治学研究》第4期。
- 周光礼、吕催芳 2011,《中国大学与政治社会化: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证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第8期。
- 周可卫 2010,《互联网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应对》,《中国青年研究》第3期。
- Chan, Steve 2008, "Chines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Comparative Context: Cautionary Remarks on Cultural Attribu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3(3).
- Chang, Yutung, Yunhan Chu & Minhua Huang 2011, "Procedural Quality Only? Taiwanese Democracy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2(5).
- Chu, Yunhan & Minhua Huang 2010, "Solving an Asian Puzzle." *Journal of Democracy* 21(4).
- Chu, Yunhan, Larry Diamond, Andrew J. Nathan & Doh C. Shin 2008,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Minhua, Yunhan Chu & Yutung Chang 2013, "Popular Understandings of Democracy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East Asia."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9(1).
- Huang, Minhua, Yutung Chang & Yunhan Chu 2008, "Identifying Source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A Multilevel Analysis." *Electoral Studies* 27(1).
- Inglehart, Ronald & Wayne E. Baker 2000,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1).
- Nathan, Andrew J. & Tianjian Shi 1993, "Cultural Requisites for Democracy in China: Findings from a Survey." *Daedalus* 122(2).
- Shi, Tianjian 1996, "Survey Research in China," In Michael Delli-Carpini et al. (eds.), *Research in Micropolitics: Rethinking Rationality* (Vol. 5). Greenwich: JAI Press.
- 2001,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4).
- 2014,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in, D. Chull & Youngho Cho 2010, "How East Asians Understand Democracy: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EN* 116 (July).
- Tang, Wenfang 2016,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Regime Sustainabi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赵联飞

migrant adolescents' crime prevention. Based on the baseline survey data from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2013-2014)",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tudents of the first grade in middle school, and applies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condition of social bond between migrant adolescents and local adolescent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for the migrant adolescents, their scores in attachment and belief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local adolescents, while there are no differences in commitment and involvement between them. On this basis, we try to put forward the intervention strategy to prevent the migrant adolescents' delinqu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services.

Keywords: Migrant Adolescents Crime Social Bond Theory Social Work

The Difference Analysis o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Democratic Evaluation

..... *Yu Hongbo & Wu Xinzhe (38)*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democratic evaluation is commonly valued by each country. This study uses the relevant data from "Chinese Youth Values Survey", and further uses the sec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Differences in Democratic Evaluation" to compare the college students' evaluation of democratic level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exploratory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college students generally support democracy, bu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ization and contextualization still affect their democratic evaluation profoundly. In addition,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evaluation towards national governance in China indicates tha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ompetence and the perfec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China's governance-style democracy would receive more identification from college students. Meanwhile the college students would possess more system confidence when facing western democracy.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affection of national glory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evaluation of democracy in China, but i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evaluation of democracy in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is means that the so-called "narrow nationalism" is untenable at lea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article. Hence, this paper could strongly refute the discourse hegemony implied in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evaluation.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Evaluation of Democratic Level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Labor Control and Young Laborers' Mental Health

..... *Liu Cheng (50)*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mental health, the mainstream analysis perspective of "inequality-stress-support" doesn't fully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s of work environment and labor process. Based on the labor process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factory regime in China, this article uses the data from "The Survey on Laborer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and labor control on young laborers' mental health.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for the enterprises with intensive human capital, comprehensive welfare security and good development trend, their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could improve the young laborers' level of mental health; while for the enterprises with strict labor control and insufficient labor protection, their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may lead young laborers' mental disorder problems easily. In order to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mbalance in labor relations and promote young laborers' mental health, we try to provide some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namely standardizing the enterprises' employment behavior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 etc.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Labor Control Mental Health Young Laborers